

張茂桂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

A-Qin Hsiao (蕭阿勤), 2000,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.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.

盧建榮, 1999, 分裂的國族認同, 1975-1997。台北: 麥田出版。

### 民族與國家，文化與政治

不同時代生長在台灣的「文化人」，有些是懷抱大中國意識的大陸籍作家，有些是主張台語文或者台灣人本色的 Hoklo 人或者客家人，有些是素樸的「語言」學家，有些是文化官僚，他們如何詮釋、表達、重建、試圖影響國家民族問題？我們要如何解讀作家們字裡行間的民族主義訊息與論述？蕭阿勤和盧建榮的兩本書，分別用不同的研究取徑以及表達方式，提供了他們的看法。

蕭阿勤的書，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，改寫自原來的博士論文，因為獲得跨國的「超大」學術書籍出版公司 (Routledge) 的推薦出版，毫無疑問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；而這本書的主要研究問題，是台灣「文化」民族主義的形塑過程，以及它與「政治」民族主義的關係。<sup>1</sup>所謂「文化」民族主義，和「政治」民族主義，是不同的兩個概念。蕭阿勤從 Hroch 那

<sup>1</sup> 蕭阿勤對於此一研究题目的中文著作，有〈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〉，《台灣社會學研究》，3: 1-51, 1999；〈民族主義與台灣1970年代的「鄉土文學」：一個文化（集體）記憶變遷的探討〉，《台灣史研究》，6(2): 77-138, 2000。

裡得到靈感，蕭認為，如果「政治」民族主義是以建立「獨立國家」為目的，屬於政治制度層面，那麼，「文化」民族主義則是以創造一種具有特殊文化意涵的民族「意識」為目的。因為，一個民族國家獨立建國的主張，如果要有說服力，恐怕要不斷營造關於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意識建構。

不過，蕭阿勤緊接著對於 Hroch 的民族主義的三個階段，提出不同的看法。簡單地說，Hroch 主張民族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是受支配群體的文化人，對於文化、歷史、語言的「自覺」運動，第二階段，是致力於民族意識的「喚醒」工作，第三階段才是大規模的政治「動員」與抗爭。但是蕭阿勤用台灣文化界的台灣意識的發展歷程，提出了反例。蕭認為，台灣的「文化」民族主義，也就是 Hroch 所說的前兩階段，事實上是在政治（獨立）運動抗爭之後才陸續發生。

蕭阿勤認為，轉變的關鍵點，在於發生於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對於很多台籍作家、歷史學者的衝擊。在此之前，台灣文化界的台灣意識，根據相關作者的不同文本論述，經常是用來表示一種有特殊台灣意義的「中華民族的地方意識、平民意識」，並不是具有特殊民族文化意義的「台灣意識」。但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，年輕台灣作家用文學書寫的方式，投入台灣文化特殊性的建構運動，或者「台語文」的建構，提倡「台灣史」研究，並提出台灣民族史觀，不但越來越多，也轉向否定台灣文化中的中國意涵，試圖建立獨一無二的台灣人、台灣民族的文化觀。

蕭阿勤使用「論述分析」的研究方式，檢視當代可歸類為「台灣意識」的作家群，文學評論者，語言學家（大多是素樸的

台語文研究者），他們的台灣人意識的內容的起源，以及內容如何演變的過程。他的分析材料，主要來自這些文人過去書寫的「文本」，他們在過去「公開」說了些什麼，in print。他特別指出，台灣文藝、笠詩社的立場轉變，台灣筆會的出現等，他們從避而不談台灣意識，或者從認為台灣（地方）意識和中國（民族）意識可以共存，到 1980 年之後，開始提倡台語文書寫方式，並大力鼓吹獨一無二的台灣（民族）意識立場。他也提到葉石濤在 1987 的「台灣文學史綱」，到 1993 的新版中的一些重要的自我調整，以及葉石濤有關 1970 年代「鄉土文學」的解釋，如何從先前一個不反對中華民族意識的立場，到晚近一個清楚的認同台灣民族，與反對中華民族意識的立場。

蕭阿勤在書的結論中，對於當今不同統獨立場的文人與史家，都提出了一項質疑。對於台灣民族主義者，蕭的質疑是，這其實是一個發展過程，有自覺與後殖民的自我矛盾的地方，它的晚近發展，當然是受到外在政治動員，比如像美麗島事件的刺激。所以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，不是泥土中原來即以存在的種子，也不是「藏在瓶中的精靈」，等待瓶蓋打開而展開。而對於統派的民族主義者，蕭的質疑是，即便說台灣民族主義是一種「latecomer」，是經過政治刺激才發生的，這並不代表它就是「假」的意識型態，民族主義不論在中國還是台灣，都經過了現代的發明與創造的過程，既沒有真假之分，也沒有高低之別。

無疑的，這本書不論在資料以及論述分析方面，都展現了作者的傑出的品質。但是作者對於美麗島事件以及政治動員的強調，或許過度，這使得台灣「文化」民族主義的發生的過程，被形容成是不連續的兩個階段。單單就「得以公開發行」的文本來

說，蕭阿勤的主論點也許有充分的理由，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白色恐怖，高壓的言論政策對於文本書寫者所產生的自我限制以及壓抑作用，得以公開發行的文本，一定能代表當時的論述者，所認同的想法嗎？其實，只要我們不把「民族」當成一種不變的、本質文化，而是與外在環境不斷進行理性與道德的思辨過程，那麼，「文化民族主義」也許真的是「瓶中精靈」，而這裡所謂的「瓶子」，就是箝制人類自由表達的高壓政治牢籠。

稍早出版的盧建榮的關於「分裂的國族認同」一書，本書並不像蕭阿勤有明顯的理論企圖，但是他對於1975-1997年間的一些當代作家，進行族群背景、民族意識立場，進行綿密的分析與解讀。是什麼原因，讓一個歷史研究者，特別是一位自稱在這個議題上是「獨學而無友」的「新文化史」的研究者，大膽的跳入一個原來就充滿爭議，容易讓人激動的「當代」議題，除了對於傳統歷史研究方法的不滿之外，恐怕還是歷史學界對於華夏中心以及「中華帝國」的理所當然接受以及缺乏反省。

蕭阿勤分析了台灣（意識）文學與台灣籍文化菁英的轉變，以及時空脈絡，他謹守文本論述分析的法則，相當程度他忠於公開發表的文本內容，不做推論與過度詮釋；而盧建榮的作法則不太一樣。一方面盧建榮對照不同省籍作家的文本，因為外省背景的作家和台灣人作家（有時也包括歷史學者），他們之間有明顯的「文化交鋒」，而另一方面，盧也對作者的意圖，時而進行主觀的解讀與推論。盧建榮的目地，並不僅限於提供讀者門關於不同的作家們的族群或者國族觀點，他更希望能對於這個時代的「庶民文化」，提出佐證。因為他相信，文學作品所描述的人物與社會現象，除了可以透露作者的心思，（當然，需先經過讀者

的辯證性閱讀），也能知道當時社會的意識流動。爲了在這兩個議題之間建立適當的連結，他希望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之中，加入歷史文本，如評論、報告、報導、政令宣傳等文類的評述。

雖然說相同族群背景的作家，可能有某些共享的族群觀點，但是，這也可能是盧建榮的選擇性的建構結果。事實上，我們很難知道不同籍貫作者的文本，除了代表他個人之外，他是否也代表了某一種背景，某一種族群立場，也不能知道不同文本的作者，在「庶民文化」中所處的代表性問題。而盧建榮試圖結合不同的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的努力，並未能在各章節中充分出現。因此本書最大的貢獻，與其說，在能對當代的「庶民文化」提出更多的理解，不如說在對於不同省籍作家的族群與國族關懷，能提出公允的解讀。

爲補充對於時代背景解釋的不足，作者離開文學作品的文本解讀，而提出1980年後期，台灣的語言與政治、社區文化、文化政策、教科書問題、歷史學者的辯論等等，（本書第七章）這對本書的歷史分析立場，無疑是必要的。而本書所提這一類「文化與政治」的問題，更開創出一個新的研究典型。如今，在所謂「政黨輪替」之後以及21世紀的台灣，仍然不斷發生。不過，晚近「本土化」所面臨的挑戰論述，已經不完全是來自本書所說的「大中國意識」，而同時是新興的「全球化」論述。這樣的「全球化」論述，固然和台灣必須不斷「提升競爭力」，以及要加入WTO有密切關係，但很弔詭的是台灣如果要「提高國際競爭力」，就必須考慮和大陸的經濟發展有更緊密的結合，（所謂加速三通問題的解決），此一形勢的政治效果，就是直接影響到「本土化」中的台灣民族意識的打造工程。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與經濟

包圍的態勢，使得具有本土意識的文化工作，在直接挑戰大中國的文化版圖的時，就不得不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主張，做出妥協。比如，台灣一些人開始討論「文化」中國，有別於「政治」中國，或者，自認台灣人的政治人物，如果被逼表態，就自我認定為「華人」，但仍有別於「中國人」，這些論述文本，都構成另外一種曲折的台灣「文化民族主義」路線。

蕭阿勤和盧建榮對於民族／國族主義的誕生，都站在所謂「現代論」的基礎上去討論。所謂「現代論」是強調民族主義是一種晚近的「新發明」，是一種對於自身的新的政治想像與行動目標。就歐洲來說，發生於18世紀末期，就中國來說，大約發生於19世紀末期，20世紀初期，而就台灣來說，蕭阿勤則認為更晚，「美麗島事件」是一個關鍵時期。

我個人同意大部分「現代論」的看法，但是反對一種「強」的「現代論」，比如 Ernest Gellner 的立場，他將民族文化，當成是一個新時代，全新的政治運動的結果，或者全新的發明，（不論它是有或者沒有「肚臍眼」、有或者沒有「孕育母體」，對於一些和民族的「過去」有關的文化因子的比喻，他都認為不重要）。<sup>2</sup>而我偏向同意 Duara 對於中華民族主義的看法，<sup>3</sup>中華民族主義的發生，是有「文化上的起源」，但是卻是「多路徑論述」，面對外部侵略壓力，經過「內部政治競爭」而逐漸形成的「新發明」。它既是「新發明」，但是也有「舊的基礎」。所謂

「舊的基礎」，也不是如民族主義者所宣告那樣的一成不變的血緣關係，而是對於既有的相關論述，比如關於「人種」、「文化正統」、「非我族類」等傳統論述加以重新整理（包括遺忘或新詮釋），然後摻雜了「新」的「國家」與「主權」概念後的結果。<sup>4</sup>最後，我也希望指出，不同的殖民過程對於民族主義形成的影響，雖然在兩本書中，都有提到，但是似乎並沒有獲得深入的討論，這或許是以後研究可以推進的方向。

<sup>2</sup> Ernest Gellner 晚年和他的學生 Anthony Smith 的一場友善辯論 (The Warwick Debate, 1995) 部分節錄出版於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(3): 357-370, 1996.

<sup>3</sup> Duara, Prasenjit,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,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, 30: 1-26, 1993.

<sup>4</sup> 而我從另外的角度，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變化進行研究，也達到類似的研究結論。參考 Chang, Mau-kuei, On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, China Perspectives, 28: 51-70.